



· 哲学 ·

人民·联盟文库

JIXIANLIN TAN YILI

季羨林谈义理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季羨林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 人民·联盟文库 •

季羨林谈义理

季羨林 著 梁志刚 选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季羡林谈义理/季羡林著;梁志刚选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人民·联盟文库)

ISBN 978-7-01-008623-1

I. 季… II. ①季…②梁… III. 比较文化—文集 IV. 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3122 号

季羡林谈义理

JIXIANLIN TAN YILI

季羡林 著 梁志刚 选编

责任编辑:王裕江 安新文

封面设计:曹一春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电话: (010) 65250012/6528953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顺兴印刷厂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20.75

字 数:262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8623-1

定 价: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人民出版社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是我们党和国家创建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几十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与脚步，他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出版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秀出版物，为丰富人民群众的学习、文化需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环境、地域及发行渠道等诸多原因，许多精品图书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为了有效地利用和二次开发全国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优秀出版资源，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也为了提升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的整体形象，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决定，在全国各成员社已出版的数十万个品种中，精心筛选出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前沿性及可读性的优秀图书，辑编成《人民·联盟文库》，分批分次陆续出版，以飨读者。

《人民·联盟文库》的编选原则：1. 充分体现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术水平和出版风格；2. 展示出各地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特色；3. 图书主题应是民族的，而不是地区性的；4. 注重市场价值，

要为读者所喜爱；5. 译著要具有经典性或重要影响；6. 内容不受时间变化之影响，可供读者长期阅读和收藏。基于上述原则，《人民·联盟文库》未收入以下图书：1. 套书、丛书类图书；2. 偏重于地方的政治类、经济类图书；3. 旅游、休闲、生活类图书；4. 个人的文集、年谱；5. 工具书、辞书。

《人民·联盟文库》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物、译著六大类。由于所选原书出版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版单位，在封面、开本、版式、材料、装帧设计等方面都不尽一致，我们此次编选，为便宜读者阅读，全部予以统一，并在封面上以颜色作不同类别的区分，以利读者的选购。

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委托人民出版社具体操作《人民·联盟文库》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所选图书出版采用联合署名的方式，即人民出版社与原书所属出版社共同署名，版权仍归原出版单位。《人民·联盟文库》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成员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部分专家学者及发行界行家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人民·联盟文库》编辑委员会

编者的话

季羨林教授已届期颐之年。这位世纪老人近 20 多年对人类文化和人类命运反复思考，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蒙季羨林先生准许，编者从作者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的演讲和文稿中，摘录反映文化发展规律，即关于“义理”的若干段落，辑成本书。作者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位语言学家。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有些人看来，这种思考是外行的，或者是另类的。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季羨林的许多观点已经或者正在为人们的实践和历史发展所证实，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的独具慧眼和远见卓识。编辑王裕江先生建议我写一篇导读。季羨林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写导读为我力所不逮，不过作为本书编者和季羨林教授的弟子，我有责任把自己的学习体会，作为引玉之砖，奉献给广大读者。

“义理”这个词是旧学常用的概念，最早见于《汉书·刘歆传》，宋代以后称道学为义理之学，清代学者姚鼐在《复秦小岍书》中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季羨林沿用或借用了这个概念。他说：“我一生治学，主要精力是放在考证上的，义理非我所好，也非我所能。”“我在这里使用‘义理’二字，不是清人的所谓‘义理’，而是通过考证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在考证之外的某一种结

论。”义理，换一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探索规律。

探索什么规律呢？探索的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季羨林研究的是广义的人类文化，他说：“我认为凡人类的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世界上林林总总的民族，不论大小、久暂，只要存在或者曾经存在，总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有所创造，就是对人类文化有所贡献。因此，人类文化来源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文化有个特点，它是天下为公的，他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向外流传，它既可以为这一个地区、民族的人们服务，也可以为那一个地区、民族的人们造福。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交流，互通有无，相互吸收，相互学习和融合，自己原来没有的东西有了，原来不会的学会了，他们的本领越来越大，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越来越多。文化的交流，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每个民族的固有文化，构成了它的民族传统，而吸收、借鉴和融合外来文化，就形成了它的时代特征，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以民族传统为经线，以时代特点为纬线织成的锦缎。人类文化就是这样多姿多彩的，五光十色的锦缎。

在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文化宝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贡献又不完全一样。有的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对周围的民族或国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积之既久，形成了一个文化圈或文化体系。根据季羨林多年研究，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个大文化圈：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闪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在这四个文化圈内有一个主导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个民族或国家又是互相学习的。在各个文化圈之间也是互相学习的。这种相互学习就是文化交流。倘若从更大的宏观上来探讨，这四个文化圈又可以分成两大文化体系：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第三、第

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学习的。仅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从历史上来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发展趋势上看，21世纪，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将重现辉煌。

季羨林的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呢？不是靠简单的逻辑推理，也不是靠条分缕析的分析求证，而是靠对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人类文化现象长期观察和研究得出的结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季羨林数十年在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艰苦攀登，历史、宗教、文学、语言、美学、哲学等学科的一个个山头被他踩在脚下，还应用了新兴的“模糊学”、“混沌学”理论，他终于透过复杂纷纭的文化现象看清了东西方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出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季羨林教授是一位语言学家，语言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工具。季羨林掌握古今中外几种重要语言：母语而外，精通英语、德语、古代印度的梵文、巴利文、吠陀语和吐火罗文（中国新疆的古代焉耆语和龟兹语），能阅读法语和俄语书籍，涉猎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这为他观察人类文化提供了一把独特的钥匙。我们知道，当一种东西被发明或者发现，从甲地传到乙地，往往把它的原来名字也带到乙地，这就为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佐证。例如，季羨林从“浮屠”与“佛”这两个不同的译名入手，探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路径，经过数十年研究，证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传布道路至少有两条：大月氏（大夏）和中亚西域诸小国；又如，他在一张敦煌写经残卷的背面发现熬糖的记载，看到了“熬割令”这个词，“熬割令”是什么？原来是梵文 *sarkara*，就是“蔗糖”这个词。这个词在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中的发音也是同梵文基本一致的。于是，他开始研究蔗糖及其制作方法在各民族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历史，经过两年在书海中艰苦寻觅，查遍了所有可以找到的中外文资料，

写出了80万字的皇皇巨著《糖史》，以糖为媒介介绍亚欧各民族人民相互学习交流的历史。

语言是思想的外化，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千差万别的。季羨林发现，人类的思维模式尽管千差万别，但不出分析和综合二种。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根本的差别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主分析，东方主综合。近代以来，主分析的西方思维方式风靡世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但也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埋伏了巨大的危机。人类面临诸多巨大的难题：能源匮乏，淡水不足，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态失衡，物种灭绝，新疾病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等。这些问题，靠西方那种分析思维，一味强调发展，诛求无厌，不计后果，是不可能解决的。出路何在呢？季羨林的研究结果是，唯有以东方的综合思维济西方的分析思维之穷，以东方文化济西方文化之穷。东西方文化互补，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二者不可能平分秋色，究竟以哪一方为主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看一看季羨林教授对两个口号的比较研究，就一清二楚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分析的西方提出的典型口号是“征服自然”；而主综合的东方则主张“天人合一”，季羨林对这个古老命题的新解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中国，更有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的思想。很明显，这不是方式方法之争，而是根本立场之争。今天我们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两个口号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吗？

一种文化要发展进步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发扬光大自己的传统文化之精华；二是积极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与时俱进。二者缺一不可。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它历来就是开放的体系，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输液”，一次是汉唐佛教的输入，一次是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一次是五四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输入。这些外来的文化已经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中华文化不断发展，历久弥新。佛教的传入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季羨林作为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对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成果是独到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化的佛教已经成为国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是来引用季羨林教授的一段话吧：“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一种植物，必须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时间一久，就会退化。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

对于西方文化，鲁迅先生主张“拿来主义”。季羨林认为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同时他主张，在拿来的同时，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送出去的。他认为，我们的好的东西很多，最重要的如汉语，“民胞物与”的思想，还有和谐观。他说，“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时至今日，我们又提出‘和谐’这一概念，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中国现在正大力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可以说是适逢其时。我活了将近100年了，从未看到过这么好的一个时代。”

季羨林先生的这些重要观点，是他多年的研究成果，闪烁着东方智慧的光辉。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掌握这些观点，对我们把握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为人类文化发展作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季先生是2006年“感动中国”

十大人物之一，他关于人生的见解和他的实际行动，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季羨林说：“我想教给年轻人的无非是：热爱祖国、热爱人类、热爱生命、热爱自然。我认为，这四个‘热爱’是众德之首。有了这四个‘热爱’，国家必能富强，世界必能和睦，人类与大自然必能合一，人类前途必能辉煌。”

编者辑录的这本《季羨林谈义理》，内容包括：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人类四大文化体系和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特点；东方特有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新解；处理好三个关系以实现和谐；文化交流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佛教的中国化；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读书治学的方法和态度；获得成功的三个要素；对于人生的感悟以及关于老年的见解等，共 13 个单元。每个单元的内容按时间排序，这样读者可以看到季羨林一些重要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脉络。有些话语摘自不同的文稿，尽管摘录时作了一些删节，但考虑到内容的完整，有些字句难免有所雷同，编者以为，聪明的读者可以了解作者经常强调的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强调。作者多次声明自己不擅长哲学思辨，从来无意构建什么哲学体系，编者这样分类编排不过是想为读者学习和研究季羨林的重要观点提供一个索引。季羨林教授治学领域广泛，著作等身，这本语录体的小册子实在无法让读者一窥全豹。

《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在 21 世纪，我们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面对重要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东西的世纪老人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对我们无疑是弥足珍贵的。编者愿和广大读者一道，认真研读季羨林先生这些重要观点，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推动人类文化进步而努力。

梁志刚

2007 年 11 月 30 日于北京

目 录

一	文明与文化、中国文化	1
二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1
三	两种思维方式：分析与综合	47
四	“天人合一”新解：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	59
五	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前进	79
六	论和谐：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121
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与行	129
八	中国知识分子与爱国主义	153
九	佛教的中国化，部派的形成与传承	181
十	关于读书与治学	231
十一	勤奋、才能与机遇	259
十二	人生絮语：爱祖国、爱人类、爱生命、爱自然	269
十三	老年谈老：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决不能把生命白白浪费掉	299

一 文明与文化、中国文化

什么叫“文化”？

我们这个讲座叫“东方文化系列讲座”。写文章、说话也常谈到“文化”。但你给“文化”下个定义，并不容易。现在世界上对“文化”下的定义有几百个。有的说两百个，有的说六百个，我没做统计。但还没有一个定义是大家都同意的。大家都会感觉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包括人文科学，要给某个现象下个定义十分难，而自然科学较容易。如“直线”，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是“直线”。大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可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什么是“美”，不知有多少定义。我看了后感到都有些合理的地方和不合理的地方。今天，我也不想给“文化”勉强下一个定义，我只想谈谈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凡人类的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这是我对“文化”的理解，也可以算做一个“定义”吧。同志们看后会觉得，这不像定义。定义必须叙述得很神秘，拐很多弯，用好些形容词等等。这样的事我干不了。我就是这样理解的，也可以说是最广义的文化吧。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1987年）

“文化”和“文明”有何区别？

同志们写文章也好，讲话也好，提到“文化”、“文明”，不知大家

对此是否进行过研究。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明”？我在这里也不是研究，也还是讲自己的理解。一般的英文字典，“culture”是“文化”，“civilization”是“文明”。可是有的英文字典“culture”又是“文化”，又是“文明”；“civilization”也又是“文化”，又是“文明”。法文字典也一样。这说明这两个词有共同的地方。平常我们讲“东方文化史”也可以说“东方文明史”。可是有的时候，这两个词就不能通用。如“文明礼貌”，你说“文化礼貌”就不行。“学文化”你不能说“学文明”。因此，这两个词还有区别。我认为“文明”是对野蛮而言的，“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但“野蛮”和“愚昧”又有联系，“野蛮”中“愚昧”成分居多，也有不愚昧的“野蛮”。我们学文化是因为过去没文化，学了文化把“愚昧”去掉了。我们讲文明礼貌是过去不文明，有一些野蛮，提倡文明礼貌，把“野蛮”成分去掉了。同志们或许觉得我这样理解过分简单化了，但简单化比一点想法都没有要好。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1987年）

文化的产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我认为文化、文明的产生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这种说法是有的，这就是法西斯希特勒，他认为文化都是雅利安人创造的。最近有人说人类起源于云南的元谋。我觉得其中有点问题。这不能称为“爱国主义”，这是“超爱国主义”。非洲也有人讲人类起源于非洲。关于人类起源这个问题很复杂，大家都没吵清楚，恐怕若干年后也吵不清楚。人类绝对不是起源于一个地方，不是元谋，也不是非洲。文化也是这样。一个部族、部落的创造、发明，比如火的发现、工具的使用，再晚一些，比如农耕、建筑等，都是人类文化的创造。但不一定在一个地方。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这样说也许有人会问，是否否认我们常讲的文化体系？不，我认为

世界文化是有体系的。我的看法是有四大体系，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有人说还有希伯来文化，我看很难成体系。它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合在一起。世界文化是有体系的，我们不能否认。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中有三个文化体系是在东方。中国、印度、伊斯兰阿拉伯，它们的文化各有特点，有它的独立性，对其他国家有影响。专就文学而论，日本、朝鲜、越南的文学，很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中世纪的印尼、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的文学受印度文学的影响。乌尔都、现代印尼，以及印度的一部分受穆斯林阿拉伯的影响。所谓“体系”，它必须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我讲的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文化体系并不矛盾。

《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1987年）

周一良先生曾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狭义的、广义的、深义的。前二者用不着再细加讨论，对于第三者，深义的文化，周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

在狭义文化的某几个不同领域，或者在狭义和广义文化的某些互不相干的领域中，进一步综合、概括、集中、提炼、抽象、升华，得出一种较普遍地存在于这许多领域中的共同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称为深义的文化，亦即一个民族文化中最为本质或最具有特征的东西。

他举日本文化为例，他认为日本深义的文化的特质是“苦涩”、“闲寂”。具体表现是简单、质朴、纤细、含蓄、古雅、隐而不发、不事雕饰等。周先生的论述和观察，是很有启发性的。我觉得，他列举的这一些现象基本上都属于民族心理状态或者心理素质，以及生活情趣的范畴。

把这个观察应用到中华民族文化上，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我不想从民族心态上来探索，我想换一个角度，同样也能显示出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或者内涵。

在这个问题上，寅恪先生实际上已先我着鞭。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寅恪先生写道：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

我觉得，这是非常精辟的见解。在下面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中略）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中略）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

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苦，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我只举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全出于《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一集。

梁漱溟先生说：

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

冯友兰先生说：

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狱、轮回等，这是“鬼学”，讲的是鬼；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

庞朴先生说：